

天津市重点出版扶持项目

津沽名家文库(第一辑)

中国文艺思潮史稿

朱维之 著

津外借

先秦两汉史

宋代经济史

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古典小说理论

经济杠杆论

秦漢史綱要

西洋文化史綱要

南开大學出版社

唐詩考

中國古史綱要

马可波罗在中国

天津市重点出版扶持项目

津沽名家文库(第一辑)

中国文艺思潮史稿

朱维之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艺思潮史稿 / 朱维之著.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9.4

(津沽名家文库. 第一辑)

ISBN 978-7-310-05775-7

I. ①中… II. ①朱… III. ①文艺思潮—文学思想史—中国 IV. ①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59604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刘运峰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

北京隆晖伟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210×148 毫米 32 开本 13.375 印张 6 插页 335 千字

定价: 88.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23507125



朱维之先生(1905—1999)

“中西文艺思潮比较”教学大纲

- 一. 学书——一学期二学分
- 二. 对象——世界文学系东方文学方向研究生二年级
- 三. 教师——朱维之
- 四. 目的——对中西文学思潮有个基本认识
- 五. 方法——给予启发式的讲解，让学生独立研究
- 六. 内容——

1. 绪论：中、西文艺思潮的根源是什么？
2. 儒家思潮
3. 道家思潮
4. 佛家思潮
5. 儒、道、佛三家思想的融合和变化
6. 西方古典思潮（希腊、罗马）
7. 西方中世思潮（希伯来、基督教）
8. 日耳曼思想的成长及中作用
9. 文艺复兴与三个思潮的融合、变化
10. 中西思潮的接触和前途

七. 参考书——

1. 朱维之《中国文艺思潮史稿》
2. 《中国文艺比较》杂志资料
3. 高勒克，改论《文学理论》
4. 北师大《比较文学研究资料》
5. H. H. The Background of European Literature

群青 83.2 20×20=400

页

朱维之先生手迹

出版说明

津沽大地，物华天宝，人才辈出，人文称盛。

津沽有独特之历史，优良之学风。自近代以来，中西交流，古今融合，天津开风气之先，学术亦渐成规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校院系调整，学科重组，南北学人汇聚天津，成一时之盛。诸多学人以学术为生命，孜孜矻矻，埋首著述，成果丰硕，蔚为大观。

为全面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天津学术发展的面貌及成果，我们决定编辑出版“津沽名家文库”。文库的作者均为某个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在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影响，所收录的著作或集大成，或开先河，或启新篇，至今仍葆有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论著的价值已经从单纯的学术层面生发出新的内涵，其中蕴含的创新思想、治学精神，比学术本身意义更为丰富，也更具普遍性，因而更值得研究与纪念。就学术本身而论，这些人文社科领域常研常新的题目，这些可以回答当今社会大众所关注话题的观点，又何尝不具有永恒的价值，为人类认识世界的道路点亮了一盏盏明灯。

这些著作首版主要集中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出版后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然而由于多种原因，近几十年来多未曾再版，既为学林憾事，亦有薪火难传之虞。在当前坚定文化自信、倡导学术创新、建设学习强国的背景下，对经典学术著作的回顾

与整理就显得尤为迫切。

本次出版的“津沽名家文库（第一辑）”包含哲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五个学科的名家著作，既有鲜明的学科特征，又体现出学科之间的交叉互通，同时具有向社会大众传播的可读性。具体书目包括温公颐《中国古代逻辑史》、马汉麟《古代汉语读本》、刘叔新《词汇学与词典学问题研究》、顾随《顾随文集》、朱维之《中国文艺思潮史稿》、雷石榆《日本文学简史》、朱一玄《红楼梦人物谱》、王达津《唐诗丛考》、刘叶秋《古典小说笔记论丛》、雷海宗《西洋文化史纲要》、王玉哲《中国上古史纲》、杨志玖《马可·波罗在中国》、杨翼骧《秦汉史纲要》、漆侠《宋代经济史》、来新夏《古籍整理讲义》、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季陶达《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石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略》、杨敬年《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王亘坚《经济杠杆论》等共二十种。

需要说明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的更新和学科的进步，某些领域已经有了新的发现和认识，对于著作中的部分观点还需在阅读中辩证看待。同时，由于出版年代的局限，原书在用词用语、标点使用、行文体例等方面有不符合当前规范要求的地方。本次影印出版本着尊重原著原貌、保存原版本完整性的原则，除对个别问题做了技术性处理外，一律遵从原文，未予更动；为优化版本价值，订正和弥补了原书中因排版印刷问题造成的错漏。

本次出版，我们特别约请了各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为每部著作撰写导读文章，介绍作者的生平、学术建树及著作的内容、特点和价值，以使读者了解背景、源流、思路、结构，从而更好地理解原作、获得启发。在此，我们对拨冗惠赐导读文章的各位学者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同时，我们铭感于作者家属对本丛书的大力支持，他们积极

创造条件，帮助我们搜集资料、推荐导读作者，使本丛书得以顺利问世。

最后，感谢天津市重点出版扶持项目领导小组的关心支持。希望本丛书能不负所望，为彰显天津的学术文化地位、推动天津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做出贡献，为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做出贡献。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9年4月

《中国文艺思潮史稿》导读

崔宝衡

再一次捧读朱维之先生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稿》，禁不住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此书于1988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至今已三十年，而朱先生离开他热爱的南开园，也将近二十年了。朱先生是1999年以九十五岁高龄仙逝的，当年受家属的嘱托，我和王立新教授为先生撰写墓志，墓碑上镌刻先生几部重要著作的图像，其中就有这部《中国文艺思潮史稿》。

—

朱先生1905年出生于浙江苍南县的一个农村家庭，少年家贫，中学毕业后进入免费的南京金陵神学院读书。三年时间，他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基础，也培养了对基督教文化的兴趣。1927年，受大革命思潮的影响，朱先生投笔从戎，随军北伐。大革命失败后，他到上海青年书局从事编译工作，1929年，凭借一篇论文《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受到当时福建协和大学（今福建师范大学前身之一）校长的赏识，于是没有读过正规大学、没有博士学位的朱先生，在该校谋得一份教职，为国文系学生讲授“中国新文学”和“文艺思潮论”课程。1930年，朱先生受学校选派，赴日本中

央大学、早稻田大学进修两年。回国后，他继续在福建协和大学任教，并兼任《福建文化》主编，出版学术专著《李卓吾论》。

1936年，朱先生受聘到上海沪江大学（今上海理工大学前身）任教，先后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和国文系主任。抗日战争期间，上海沦陷，朱先生困守租界孤岛，生活拮据，但他不愿投敌附逆，除了到学校教书，便是避居亭子间、小阁楼潜心著述，其间出版了《中国文艺思潮史略》《基督教与文学》等重要著作，受到学界的好评。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书店根据当年的版本，将两书收入《民国丛书》影印发行。

朱先生是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调入南开大学的，他热爱南开，终老于南开，他的主要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都在南开。他长期为南开大学中文系本科生讲授外国文学课程，培养了多名学有所长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朱先生学识渊博，举凡外国文学课程，从古代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从文学思潮到比较文学，从作家创作到作品赏析，他都游刃有余，得心应手。朱先生讲课从不按教材照本宣科，他的课总是妙趣横生，引人入胜。他通常是拿着几张卡片走上讲台，从容不迫，慢条斯理，把文学知识、文史掌故、宗教习俗、人情世态娓娓道来，讲到关键处再做言简意赅的总结、画龙点睛的提示，绝无枯燥乏味、长篇大论的说教。听朱先生的课用不着拼命记笔记，也不必担心折磨人的考试，而是能获得轻松愉快、超然洒脱的艺术享受。朱先生的教学方法，在那个充斥教条主义的年代，自然是屡受批判的，但他始终不改。有一次谈及他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时，朱先生若有所思地说：“我把文学当作美女来欣赏，有人要把她当作尸体来解剖。”一语中的，道尽其中奥妙。

朱先生在南开，除了认认真真教学，主要还是专心致志地从事17世纪英国伟大诗人弥尔顿作品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弥尔顿的

三大诗作《失乐园》《复乐园》《斗士参孙》的中译本，全部出自他的笔下。1951年《复乐园》中译本出版后，朱先生便着手进行《失乐园》的翻译。《失乐园》全诗十二卷，一万多行，翻译出版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文化大革命”前夕，朱先生已将《失乐园》翻译过半，用蝇头小楷工工整整地抄写在十几个笔记本上。不料“文革”时，译稿被全部抄走，下落不明。眼看着多年心血付诸东流，朱先生内心异常悲愤。在那段艰难岁月里，朱先生咏诵《斗士参孙》的铿锵诗句，决心将它翻译出版。《斗士参孙》描写的是古代以色列斗士参孙在身陷囹圄、惨遭凌辱的情况下，依旧葆有坚强的意志，不败的斗志，同敌人做决死斗争的悲壮故事。朱先生在译者前言中特别提示，《斗士参孙》是“诗人的自况”，反映了弥尔顿在王权复辟的黑暗年代，仍然坚持气节，同黑暗势力顽强抗争的高贵品质。其实，朱先生在“文革”期间，冒着很大的风险，翻译这样一本“不合时宜”的书，又何尝不是“译者自况”呢！“文革”结束后，《失乐园》的译稿失而复得，但已残缺散乱。朱先生又经数年努力，对译稿进行重译、补译、修改、润色，终于在1985年杀青，并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失乐园》中译本。在译者序中，朱先生写道：“本译稿经过二十二年，用业余时间断续译成。其间遭遇十年浩劫中译稿丢失、复得、返工等恼人的挫折。”寥寥数语，既道出了翻译过程的曲折艰辛，也表现了一位智慧老人的大度宽容。在此之前，朱先生翻译的《斗士参孙》也已于1982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朱先生的学术生涯中，尤以对圣经文学与希伯来文化的研究用力最勤，成果最显著。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版的《基督教与文学》《文艺宗教论集》等著作中，朱先生深入考察了宗教与文学的关系，论述了基督教对西方文学的影响。他认为，“原始时代以来，艺术和宗教一向是不可分离的”，“宗教是一门艺术，是人类

的艺术产品”，“宗教的祭坛是人民的舞台，人民艺术的摇篮”。“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学术环境好转，朱先生的学术研究也进入了生气蓬勃的新阶段。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他主持编写了《古犹太文化史》《希伯来文化》《古希伯来文学史》《圣经文学十二讲——圣经、次经、伪经、死海古卷》等著作，发表了《圣经文学的地位和特质》《希伯来文学研究的新途径》《基督教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等多篇论文，还为 1982 年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撰写了有关希伯来文学与犹太人文学的条目。在这些论著和论文中，朱先生通过翔实的资料、严谨的论证，以更加明确的语言表述他多年来研究希伯来文化与圣经文学的学术结论：“以往别人读欧美文学的源头，只注重希腊文学，不涉及希伯来文学，我不盲目从众，兼谈‘二希’。其实，欧洲在古希腊罗马文学衰落之后，并不是历史的空白；而是以早期基督教文学为代表的希伯来文学的传入，希腊文学与希伯来文学的交汇融合，便成为欧美文学的新起点，开创了西方文学的新纪元。这是我对历史的一个大翻案，也是文学史的一大翻案。”这是朱先生在世界文学教学与研究中最重要学术贡献。而他对希伯来文化与圣经文学的真知灼见，如今已为学界普遍接受。

朱先生一向十分重视教材建设。他认为，教材是教学的基础，只有编写出具有科学性与实用性的优秀教材，教学质量才有保证。教师讲课不必按教材照本宣科，但教材可以引导学生自学和思考，可以对没有机会上大学的社会青年进行文化知识的普及与启蒙。

“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朱先生首先抓的就是外国文学的教材建设。1977 年大地解冻，乍暖还寒，由朱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便交给正在组建的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现在看来，这本书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但在当时是第一部被广泛使用的外国文学专业教材。此后，朱先生又陆续主编了《外国文学简编·欧

美部分》《外国文学简编·亚洲部分》《外国文学史·欧美卷》《外国文学史·亚洲卷》《中外比较文学》等多种教材。朱先生主编教材不是只挂虚名，当甩手掌柜，而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从确立编写体例、拟订写作大纲、分工执笔到全书最后定稿，他都要亲力亲为。除了修改别人的稿件，有些重要的章节还由他亲自撰写。1985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的《外国文学史·欧美卷》，经过多次修订，至今已出到第五版，累计发行一百多万册，曾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和教育部优秀教材一等奖，在国内学界广受好评。

二

朱先生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稿》（以下简称《史稿》）是在《中国文艺思潮史略》（以下简称《史略》）的基础上重写的。这中间还有一段小插曲。1986年我到香港访学，朱先生嘱托我到香港某出版社为他的《史略》被盗印一事进行交涉。出版社态度谦恭，当即答应为朱先生奉寄稿酬和样书。当我回到学校向朱先生汇报时，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内心很是气愤。朱先生却心平气和地说：“不要去管他们，我再写一本新的。”果然，两年之后，这部内容更充实的《史稿》便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此时的朱先生已年逾八旬，视力衰退严重，看书写字都得借助放大镜，其写作之艰辛程度可想而知，其奋斗之精神令人敬佩。

《史稿》和《史略》比较起来，主要思路和框架结构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但资料更翔实，内容更丰富，观点更明确，条理更清晰。《史略》十一万字，《史稿》三十二万字，增加了近两倍的篇幅。

朱先生在《史稿》的序言和绪论中明确指出：“本书的主要意

图只是论述我国各时代文学主潮的特点，把历代主要代表作家、作品的精华荟集在一起”，以便一目了然地展示我国三千多年来“文学发展、变迁的全貌”。朱先生认为，以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大都以朝代或世纪为纲，将作家、作品依时间顺序罗列叙述，散漫琐碎，茫无际涯，令人不得要领。如若以文学体裁为纲，“单依各种文体的变化，缕述其发生、发展和衰替”，那是“只着重在文艺的躯壳，舍本而逐末”，使人难窥堂奥。朱先生根据自身的教学实践，力图打破文学史的旧体制、旧框架，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径来，这种勇于探索、革新的精神，在《史略》出版的20世纪30年代，难能可贵。从《史略》到《史稿》，不变的写作思路就是：以文学思潮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把各个时代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串联起来，既论述文艺思潮流变的原因及影响，又点评作家的创作倾向与作品的艺术特色。从而“从纵的和横的方面去归纳文艺历史仪态万千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史略》和《史稿》都是具有开拓性的中国文艺史著作。

朱先生还认为，旧文学史的分期法是“切瓜式”的，即按照朝代或世纪分期，人为地将源远流长的文学发展史切割成独立的片段，这是有悖于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他的《史稿》采用的是“波浪式”分期法。因为文学发展的历史是动态的，如同奔流不息的长江大河，思潮起伏，作家辈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此消彼长，前后重叠更替。只有采用“波浪式”分期法，才能反映文学史的真面貌。《史稿》共十二章，第一章《绪论》，其余各章依次为：《北方现实思潮的发达（西周至春秋）》《南方浪漫思潮的发达（春秋、战国）》《南北思潮的合流（秦汉魏晋）》《佛道思潮泛滥（东汉至唐前期）》《社会问题和复古运动（唐后期）》《唯美思潮的泛滥（中唐至北宋）》《民族意识的高涨（宋、元）》《文体大革命与民族意识（宋、元）》《古典主义（元、明）》《浪漫主

义（明、清）》《现实主义（清以来）》。仅以标题就可以看出，每一章的内容完全是按照文学思潮的发展变化来设定的，在时代顺序上多有重叠与重复。这就较为完整地体现了社会变迁、宗教传播、思潮更迭、文学兴衰内在的有机联系。

朱先生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学问家，他具有崇高的人文情怀和广阔的学术视野。《史稿》无疑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专著，但朱先生的学术思维与学术眼光和一些只关注中国文学的学者有所不同。在他看来，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把中国文学放置在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才能真正领会和把握中国文学的本质，才能领会和把握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共同性及其自身的特殊性。在《史略》的序言中，朱先生明确表示，他是受到西洋文艺思潮的启发而写作的。从《史略》到《史稿》，都立足于世界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来比对、梳理中国文学丰富多彩而又独具特色的发展历史，用西方广为流传的文艺思潮、文艺理论来解读中国的文学现象与作家作品。大体来说，秦代以前，我国北方文学的主流是现实思潮，而南方文学的主流是浪漫思潮，到了秦汉一统中国，南北文学思潮逐渐合流。隋唐时期，由于佛教大规模传入，并与本土的儒、道思想相结合，推动了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的多样化。而以佛经为代表的印度文学，也为传统的中国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中国文学出现了繁荣发展的新局面。朱先生指出，在西方文学史上也有类似的现象，欧洲最初的文艺思潮是希腊、罗马的古典传统哲学，以现实主义为主流；到了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兴起，希腊、罗马古代哲学与希伯来神学相结合，从而产生世界性的新宗教思潮——基督教，以圣经文学为代表的希伯来文学和希腊文学的交汇融合，开创了欧洲文学的新纪元。类似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唐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灿若星辰的唐诗、

脍炙人口的散文、引人入胜的传奇小说皆兴盛于唐代；以李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以杜甫、白居易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以李商隐为代表的唯美主义，以及韩愈、柳宗元发起的“古文运动”，都出现在唐代。它们为后世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就世界文学而言，不仅有其基本的发展规律，而且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是文学艺术繁荣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基于这样的认识，朱先生特地为《史稿》增写了《文体大革命与民族意识（宋、元）》一章，即第九章。在《中国文体大革命》这一节中，朱先生开宗明义地写道：“中国文体，在宋以前一直是以短篇的诗歌和散文为主；宋以后才有白话长篇小说和真正的戏剧，而且其后的文学也改变为以小说、戏剧为主了。传统的诗文理论范畴也被突破了。这个大变化，不能不说是中国文体的大革命。世界上有几个富有文学遗产的古国如中国、印度、希伯来、希腊等，最初的文学发展情况有两种，一以诗文为主，一以长篇史诗和剧诗为主。前者如中国和希伯来，后者如印度和希腊。但后来都发生了大变化。中国文体的大变化，主要由于民间文学和外来文学。……外来文学最早对我国文学发生影响的是印度文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它的影响下，促使我国文体的大革命。”朱先生进一步指出，印度文学中的佛经“变文”是一种韵散杂糅的文体，在印度和希伯来文学中很常见。佛教传入中国后，这种有说有唱的长篇叙事文体，开始在寺庙里流布。后来流落到城市的瓦舍勾栏和广大农村地区，内容也由佛经故事扩大为非宗教故事，从而直接促成了长篇小说和戏剧的诞生。这又和欧洲中世纪的戏剧发展非常相似。欧洲近代戏剧“原先是中世纪教会礼拜仪式的扩大，最初搬演圣经故事、圣者传说，逐渐扩大到世俗的故事；舞台从教堂里面搬到门口，再从教堂门口搬到街上去”。在民间流传衍变的过程中，逐渐发展成欧洲近代戏剧。至于小说，朱先生做了一

个大胆的猜测，他提出，像《维摩诘经变文》这种长达三十余卷、用骈文和韵文写成的宏丽叙事诗，“可能直接影响到张文成的《游仙窟》，再由《游仙窟》直接影响到日本文坛，产生了紫式部《源氏物语》那样的小说杰作”。这为比较文学研究留下了一个有趣的课题。

在《史稿》中，朱先生运用比较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来比较、梳理、概括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从全书的基本思路和总体结构来看，唐代文学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元代后期至明代前期文学类似于欧洲 17 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明代后期至清代前期文学类似于欧洲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文学，明代末期至清代末期文学类似于欧洲 19 世纪中叶兴起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欧洲古典主义是专制王权的产物，基本特征是拥护王权、崇尚理性、严守格律。中国古典主义则是明代中央集权的产物，在以《水浒传》《三国演义》为代表的长篇小说中，以《浣纱记》为代表的南戏中，都可以发现古典主义的色彩。从明中叶起，古典主义逐渐僵化，变成拟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文学应运而生。欧洲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是追求自由、崇尚感情、喜欢想象和幻想。明代杰出思想家李贽惊世骇俗的理论是浪漫主义思潮的先声，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伟大戏剧家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是中国浪漫主义戏剧的丰碑，脍炙人口的《西游记》是浪漫主义小说的杰出代表。此后，李渔的戏剧理论和他的喜剧创作，悲剧作家洪昇的代表作《长生殿》，等等，都为浪漫主义文学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近代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密切，西方的科学精神和实践思潮传入中国，促使中国文学在明末清初逐渐转向批判现实主义。但中国的批判现实主义又和西方有所不同。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多属中小资产阶级或同情下层平民的没落贵族，他们揭露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丑恶嘴脸，批判资产阶级发展